

论 1920—30 年代圣诗中译的实践

On the Translation of the English Hymnal into
Chinese in the 1920-30's

柳博赞、祝帅

LIU Boyun, ZHU Shuai

作者简介

柳博赞，北京语言大学讲师；祝帅，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LIU Boyun, Lecturer,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ZHU Shuai, Associate Researcher, China National Academy of Arts

Email: ruether@126.com; zhushuai@pku.edu.cn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translation of the English hymnal by the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in the 1920's-30's, exploring the texts, methodology, theological thought and the ethos reflected in the process. Yenching University was the primary venue for the translation project, with Liu Tingfang and Yang Yinliu being the most prominent translators, but several denominations contributed to the project. Translations, original works and research articles published in periodicals like *Zi Jing* (Amethyst) or *Sheng shi yu sheng yue* (Hymns and Sacred Music) reveal the scope of the endeavor to indigenize Christianity, contemporary concern for universalizing Christianity, and a sympathy towards the Social Gospel movement. Through a close reading of these texts against a background of contemporary social reality, this article shows how translation practices concern not only the original text of the hymnal and the ethos of the times, but also the translators' theological views.

Keywords: Chinese Church, Yenching University, hymnal, translation

刘廷芳译《大地风光歌》(*For the Beauty of the Earth*)^①的时候, 将原诗中的“Linking sense to sound and sight”译为“声色由空转化真”。原文的意思是将声音、视野与感官联系起来, 即在主观和客观之间搭起桥梁, 而刘廷芳的本土化的改译也与此相似: 翻译的工作正是在原语言和本土语言, 以及原诗所根植的文化和本土文化之间搭起桥梁。而圣诗是基督教敬拜的一个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集体崇拜仪式到个人灵修活动都是如此, 圣诗的传译, 也构成中国基督教 20 世纪“本色神学”探索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对于同一种宗教——基督宗教——在不同国家和文化之中的表达而言, 圣诗翻译的工作尤为重要。本文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基督教会内部对英文赞美诗的翻译出发, 来探讨该翻译工作的过程中出现的主要代表人物的译作、方法论、神学视角以及反映出来的时代背景特点。

一、作为“圣工”的圣诗中译

相对于肇始自第一位新教传教士马礼逊的《圣经》中译, 中国基督教(新教, 下同)对于圣诗在宗教传播中的深入研究与大规模的翻译实践要晚得多。1919 年中文和合本《圣经》出版之后, 有感于中国基督教赞美诗的缺席, 在 20 世纪 30 年代, 作为中国基督教“本色之探”的一个组成部分, 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师生开始在圣诗的中文译本和原创圣诗方面进行探索。以《紫晶》、《真理与生命》(后者包括《圣歌与圣乐——讨论教会生圣歌与音乐的刊物》)等

^① 刘廷芳主编:《紫晶》, 1934 年第二期, 第 270 页。收入《新编赞美诗》第 26 首,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与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 2003 年。[LEW Timothy Ting-fang, ed., *Zi jing*, no. 2(1934): 270. Collected in the *New Hymnal*, no. 26 (Shanghai: the Three-Self Patriotic Movement Committee & China Christian Council, 2003).]

杂志为阵地，刘廷芳、杨荫浏等或译配，或原创，或为圣诗的翻译、创作和配乐原则做出了深刻的阐释。这些是中国本土基督教会圣诗中国化的一次宝贵的尝试，为日后的中文基督教圣诗奠定了基础，也推动了中国基督教会本身的本色化进程。

《紫晶》杂志是刘廷芳于1930年在北平创立的一份基督教灵修刊物，1938年停刊。刘廷芳是《紫晶》杂志的编辑主干，即总编。杨荫浏是编辑襄理，即总编助理。撰述者还有许地山、李荣芳和谢冰心（英文署名 Wu Hsiieh Wan-yin，即吴谢婉莹）等，这些作者都是燕京大学的基督徒师生，其中刘廷芳撰写的文章占据了主要的篇幅。^①《紫晶》对圣诗和圣乐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比如“六公会联合圣歌委员会音调比赛”活动就是由《紫晶》杂志宣布了比赛的结果，分为“新调创作比赛”和“国有旧调改协比赛”，并给出了第一名酬洋二十元、第二名酬洋十元、第三名酬洋三元的奖励。^②

《紫晶》杂志的编辑通讯处就是刘廷芳的住所。^③当时燕南园的燕京大学教师住宅编号是从51到66号，而排在最前的燕南园51号正是刘廷芳所住的小楼，而排在编号最后面的燕南园66号曾经是冰心和吴文藻的住处，冰心就是在这里为圣诗的翻译做出了贡献。1934年，她以优美的文笔翻译了《欢乐赞扬歌》（*The Strain Upraise of Joy and Praise*），刊登在《紫晶》杂志上。^④

中华基督教会海淀堂（今北京基督教海淀堂）是燕京大学师生在基督教本色化道路上的另一个重要成果，而海淀堂的落成也与《紫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紫晶》刊登了刘廷芳于1933年9

^① 参见徐以骅：《教会大学与神学教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01页。[XU Yihua, *Jiao hui da xue yu shen xue jiao yu* (Fuzhou: Fujian Education Press, 1999), 101.]

^② 刘廷芳主编：《紫晶》，1935年第一期，第287页。

^③ 刘廷芳主编：《紫晶》，1934年第一期，第120页。

^④ 刘廷芳主编：《紫晶》，1934年第二期，第266-267页。

月 30 日写就的《北平海淀中华基督教会建筑新堂落成报告书叙言》，其中简单介绍了海淀堂的建堂历史以及对未来的展望。在他看来，海淀堂的种子乃是“庚子之难”（义和团运动）殉难之信徒的鲜血。从一开始的时候，海淀堂就与中国本土信徒的信仰和实践紧紧联系在一起。海淀堂的创立之人虽是外国人，但中国信徒的组织 and 奉献使海淀教会乃至中国教会得以存在并发展。这几个条件缺一不可。正因为如此，每一位中国信徒也应当尽自己所能布道和发展教会。^①在这篇《叙言》之中，刘廷芳郑重地做出了中国教会的本色宣言：“中国的教会，是中国人的教会。”^②以《紫晶》杂志和海淀堂为平台，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师生在进行本色化神学理论研究的同时，获得了重要的灵修实践阵地。

《真理与生命》是时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代理院长的徐宝谦主编的另一本基督教刊物。徐宝谦是燕京大学基督徒团契的创始人之一，曾经就读于纽约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和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是《新儒家思想的伦理实在论》（*Ethical Realism in Neo-Confucian Thought*），讨论基督教信仰与中国文化之沟通问题，而他主编的《真理与生命》，日后也为基督教圣诗中译的理论探讨提供了重要的平台。^③

^① 刘廷芳主编：《紫晶》，1934 年第二期，第 356-357 页。

^② 同上，第 357 页。

^③ 左芙蓉：《社会福音、社会服务与社会改造：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历史研究，1906-1949》，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第 156 页。[ZUO Furong, *She hui fu yin, she hui fu wu yu she hui gai zao: Beijing jidujiao qing nian hui li shi yanjiu* (Beijing: Religious Culture Press, 2005), 156.] 徐宝谦的博士论文的中文译名从雷立柏译法，参见雷立柏：《论基督之大与小：1900-1950 年华人知识分子眼中的基督教》，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 168 页。[Leo Leeb, *Lun jidu zhi dayu xiao: 1900-1950 nian hua ren zhi shi fen zi yan zhong de jidujiao*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00), 168.]

在《真理与生命》1934年第一期中，时任六公会联合圣歌编辑委员会^①主席、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的牧师刘廷芳，发表了《过来人言》这篇文章。在文章中他提出，十年前（1924年）自己在担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的时候，就非常重视中国圣歌的编写，并到受公理会邀请加入六公会联合圣歌编辑委员会，一直没有停止过促进这些工作进行。因此，他决定和杨荫浏一道编辑出版《圣歌与圣乐》杂志，作为《真理与生命》的增刊，来收集、译配圣歌，对圣诗的翻译做出研究，并加以记录。^②

教会音乐学者、作曲家杨荫浏的《圣歌探讨之初步》是《真理与生命》1934年第一期的增刊《圣歌与圣乐》中的一篇重要理论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对圣歌的选择、翻译、文字的风格、音乐的种类等等做出了综合性的描述。他提到，在1929年，中华圣公会已经指派了赞美诗委员会重编圣公会的赞美诗，同年还曾经征求用中文创造的诗歌。到了1931年，圣公会《颂主诗集》的稿本就编成了，之后又根据会众的批评建议做出了修正。同年，六公会联合圣歌委员会成立，编辑联合圣歌集。杨荫浏感叹说，在会员之中，“有的对于圣歌的历史背景，有特殊的认识；有的对于圣乐的沿革发展，有清楚的观察；有的对于神学研究，有深刻的参透；有的对于中文诗词，有高深的修养；有的对于现代文学，有相当的地位……”^③而他对这些能力的肯定也体现了他对圣歌翻译的性质和要求的看法，即传统文学功底要扎实，文笔要出色，而神学背景也要过硬。这些他所看重的方面体现在了他的翻译之中。

^① 其中包括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中华圣公会（Chung Hwa Sheng Kung Hwei）、美以美会（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North）、华北公理会（North China Kung Li Hui）、华东浸礼会（East China Baptist Convention）和监理会（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

^② 刘廷芳、杨荫浏主编：《圣歌与圣乐》，载《真理与生命》1934年第一期，第32页。[LEW Timothy Ting-fang and Yang Yinliu, eds., “Sheng ge yu sheng yue,” *Zhen li yu sheng ming*, no. 1 (1934): 32.]

^③ 同上，第34页。

1922年5月2日至12日，中华续行委员会的“基督教全国大会”在上海举行，基督教全国性组织——中国基督教协进会宣告成立，会址设在上海，此前的“续行委员会”与此同时寿终正寝。新成立的中国基督教协进会内各差会、各宗派一致达成共识，要将现行的所有圣诗编纂到一起，形成一本可以通用的诗集。当时，共有六个宗派参与了编写工作，另外还有几个宗派参与了修订工作，而他们成果就是《普天颂赞》。1936年，《普天颂赞》在上海由广学会出版。与之同时出版的还有中国基督教敬拜仪文手册《普天崇拜》。这是继中文和合本《圣经》出版之后，中国基督教会协作同工的一个重要出版成果，它们的出版，也意味着中国基督教传教运动从分散的各自为政的状态开始走向联合，从自发的状态走向自觉，并有意识地在其中突出了本土化的成果以及本土基督教学者的贡献。

事实上，在《普天颂赞》出版之前，在中国的各差会就已经有了圣诗专业机构的设立。此前，由中国各省基督教各差会中中西基督教领袖构成的中华续行委员会，就曾经设立“圣诗学”特委办。杨荫浏在《圣歌探讨之初步》中也提到，早在1929年，中华圣公会就已经设立了“圣诗委员会”来重编圣公会中所使用的圣歌集。^①1931年，中华圣公会赞美诗委员会征集了一些曲调，六公会联合圣歌委员会也创制了一些曲调，而后来六公会又联合开展了有广泛群众参与的圣诗曲调征集。^②

在圣诗的翻译、创作和配乐工作中，身为六公会联合圣歌编辑委员会总干事的杨荫浏以及身为主席的刘廷芳的工作，在《普天颂赞》收入的所有圣诗之中所占的比重最大。据研究者统计，《普天颂赞》一共收录了548首曲调，“其中杨荫浏与刘廷芳合作翻译、

^① 刘廷芳、杨荫浏主编：《圣歌与圣乐》，载《真理与生命》，1934年第一期，第34页。

^② 刘廷芳主编：《紫晶》，1935年第一期，第287页。

修订 210 首，而这 210 首中，由杨先生自己单独翻译的竟达 150 首之多。另外，他还独自作曲 15 首，作词 7 首，并撰写了《普天颂赞》数字谱即简谱‘序’。^①事实上，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新编赞美诗》出版之前，《普天颂赞》可以说一直是中国大陆地区基督教各教派最为普遍流传的圣诗版本，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基督教的“联合聚会”后，《普天颂赞》更是大显身手，成为除少数坚持使用自编自创的本土诗歌选本的教派外，大部分基督徒广泛使用和喜爱的一个圣诗选本。而直到今天，在我国香港、台湾地区，《普天颂赞》也是最受欢迎的基督教诗歌选本之一，历经多次修订，发行量居高不下。

值得注意的是，在《普天颂赞》出版之前，刘廷芳、杨荫浏的许多作品就已经通过《紫晶》杂志先行发表出来，而《真理与生命》杂志的增刊《圣歌与圣乐》也是与《普天颂赞》的编撰联系在一起的。杨荫浏在圣诗的遴选、翻译、配乐等问题上的研究有很多就刊登在《圣歌与圣乐》上，使之成为了中国圣诗成型的理论指导，也记录了圣诗翻译的艰辛历程；而《紫晶》杂志也大量登载圣诗的翻译和创作，为后人留下了这些圣诗翻译原始版本的重要资料。

二、本土化的遴选与意译

可以看到，刊登在燕京大学宗教学院两份杂志上的圣诗，在文笔方面有几个特点：（一）不一定所有的译文都完全忠实于原文，意译大于直译；（二）原创的圣诗与外国圣诗本土化翻译并重；（三）本土化色彩和个人神学主张明显；（四）受众大多是年轻人，体现出译者鲜明的性格和神学主张。

^① 翟风俭：《杨荫浏：中国宗教音乐研究的拓荒者》，刊于《中国宗教》，2009 年第 2 期，第 24 页。[ZHAI Fengjian, “YANG Yinliu: Zhongguo zong jiao yin yue yan jiu de tuo huang zhe,” *China Religion*, no. 2 (2009): 24.]

我们可以在很多中文圣歌中看到，其译文与原文字词有很大的差异。杨荫浏和刘廷芳翻译圣诗的时候，他们常常并非完全直译，而是寻求在自己看来最为贴切的词语，包括对圣诗题目的翻译。我们从中译本的题目往往无法逆推而得知英文原诗的题目是什么。内容也是做了相同的处理。略举几例：

《因恩赏赐歌》(*Lord, in Thy Name Thy Servants Plead*)^①原名意思是“主啊，你的仆人奉你的名祈求”，而杨荫浏在中文译本中将地上祈求者的视角转移到天上赐恩者的视角，从祈求之时的时空状态转移到得到恩赐之时的时空状态。实际上在本诗之中，人提出的祈求和上帝的恩赐是交互进行的，人已经在认识到万物是上帝的恩赐的前提下提出新的祈求，又在祈求之中看到未来上帝做出的回应，这种祈-应-祈-应的顺序一直向上延伸到新天新地的应许，暗含着对上帝最终信实的恩赐的信心。因此，将“主啊，你的仆人奉你的名祈求”译为《因恩赏赐歌》也不失为一种不离题且恰当的译法。

一般来说，在不严格的转译的时候，意义的传达还是比较有效的。因为译者要么将原文的精义保存下来，要么根据原文的大体意旨加以重新创作。但是，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一些稍有遗憾的译笔。比如刘廷芳所译的《簇新民族歌》(*These Things Shall Be*)，^②第二段将 *man's Lordship* 译为“人权”，但该词和 *human rights* 殊无关系，指的是人类对自然界所拥有的治理权 (*stewardship*)，这应当算是误译。如果我们纯看“人权”一词，料译者思想甚为进步，对政治用语比较敏感，但接下去第三段的 *fraternity* (博爱) 又没有翻译出来，而是用非常诗意但关系不大的“热血满腔”代替。

实际上，当时的译者和编者这些圣诗的翻译被分为了两类，我们从译者或作者名字的后面一个字可以看出来。凡是比较忠实于原

^① 刘廷芳主编：《紫晶》，1935 年第一期，第 86 页。

^② 同上，第 120 页。

文的，就被称为“某某译”，而自由发挥的程度比较高的就被称为“某某述”。其中也有原创的圣诗，比如《紫晶》1935年第一期刊登的许地山的《神佑中华歌》和朱葆元《中华教会自立歌》。这些原创的圣诗极具民族色彩乃至民族主义色彩。

许地山的《神佑中华歌》^①一开头就声称：“神明选择赐予，一片荆原棘地，我祖开辟”，仿佛中华民族也是上帝之选民，以“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精神进入并经营这一片应许之地。后面更是自豪地指出：“旧邦文化虽有，许多消灭已久，惟我独留。”许地山在这首圣诗中并未体现出对灵性提升的渴求，只是祷告上帝使中国的民众能够在生活和道德智慧上长进，这是很切实此世化的表达。

《中华教会自立歌》^②也是相仿。在这首圣诗的第三段，朱葆元用了较为古雅的辞藻写道：“文明日进，圣教大行……大造恩周，用康保民”，很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宗周德丧，青驾西升；巨唐道光，景风东扇”之以时代的变革大背景来烘托基督教传播的特点。而其中“用康保民”之语更是直接引用《周书·康诰》，“别求闻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这使民国时期的本土基督教立即有了“为往圣继绝学”的身份，跻身于圣贤品之列。

至于圣诗的阅读者和咏唱者，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有比较年轻化的特点。《紫晶》杂志的创办者、编辑和主要撰稿人都是燕京大学的师生，这决定了其中刊登的赞美诗的受众以燕大的青年教师和学生为主要假想对象。我们在这些圣诗之中发现，译者或原创者非常强调“少年”应当如何去做，来实践自己的信仰。比如，在刘廷芳述，杜毅著的《得胜歌》（*Fling out the Banner*）^③译文中，我们与原诗做出对比之后就可以意识到，其中的第五段纯属自创而非译配，而其中就有对“众少年”的呼召。兹将这段圣诗歌词列于下：

^① 刘廷芳主编：《紫晶》，1935年第一期，第115页。

^② 同上，第115-116页。

^③ 刘廷芳主编：《紫晶》，1934年第二期，第278页。

展开得胜旗，众少年！
来主麾下征服群愆，
努力猛进，希望在前，
光明天国实现人间。

《得胜歌》就是对原文做出重大改编的例子。原文共六段，译文仅五段，而且大多不对应原文，属于自创，比如“乘长风”等词句，非常具有中国传统文学的风格，在英文中无法找到相应的表达。

同样，杨振章（杨嘉仁）创作的《四时近主歌》^①第一段也有“凡我青年，寻求宜早……壮岁韶华，白驹易逝”的话。

还有，刘廷芳翻译的《青年向上歌》（*I Would be True*）^②也莫名添加了“青年”一词，为原文所未有。而其中“我施与，并不记所施何物”（*I would be giving, and forget the gift*）被翻译成很中国式的“我要施赠，义重财轻。”当然，这段歌词的经文依据是《马太福音》太 6:3 “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作的。”和《使徒行传》20:35 “施比受更为有福。”但是，刘廷芳以非常具有中国传统文学特色的“义重财轻”对《新约》的伦理要求做出了比较准确的概括。在翻译的时候，刘廷芳也做出了取舍，《青年向上歌》的原文有六段。而他只翻译了其中的两段。

沈子高所述的《耶稣呼召歌》（*Jesus Calls Us o'er the Tumult*）^③的第四段：“负主十架，从主奔跑，一心爱主，爱同胞”也是原文没有，译者自创的。非常具有“爱国”（*patriotic*）色彩。沈子高也是六公会联合圣歌编辑委员会的委员之一。《普天颂赞》中有 13 首圣诗是他译配的。

① 刘廷芳主编：《紫晶》，1934 年第二期，第 269 页。

② 同上，第 281 页。

③ 同上，第 279 页。

相对于原文而言,《爱人歌》(*O Brother Man, Fold to Thy Heart*)^①翻译的内容基本不错,只是第一段“每个笑容就是一首圣诗,每件善行就是一次祷告”被译为“祈祷颂扬,莫离和颜善行”,不知道是理解错误,还是为了译配的缘故做出了意译。而第四段“狂乱的战乐”被翻译为很中国的“战乐悲笳”,而末尾的“种下和平之树”被翻译为“盛放和平之花”,可能是因为要押韵的缘故。

刘廷芳所译的《大地风光歌》(*For the Beauty of the Earth*)^②,加上了“祖宗遗泽”和第五段“中华民族神所眷,五千年来受惠深,地上香花天上蕊,人尊美德帝垂恩”,为原文所未有。这里出现了过分的民族主义,似乎有损于基督教“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饮于一位圣灵”的大公性和人人平等的原则(参《圣经》林前 12:13)。也可能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在日后中国基督教两会出版的《新编赞美诗》中,这一段并未被收录。

此外,在译者挑选圣诗来翻译的时候,常常有意凸显一些具有民族性特点的圣诗,比如《圣巴特里克铠甲歌》(*I Bind unto Myself Today*)^③。据说这首圣诗的原词是爱尔兰护国圣人巴特里克(St. Patrick)所做,而著名爱尔兰赞美诗作家亚历山大夫人(Cecil Frances Alexander)改编之,加以古爱尔兰曲调,就成为了现在的版本。

与此相似,《紫晶》杂志 1936 年第一期中也录入了杨荫浏译的《马拉巴礼拜歌》(*Strengthen for Service, Lord, the Hands, Liturgy of Malabar*)^④。这首圣诗是基于五世纪印度南部马拉巴礼仪的礼拜歌而创作的。该教会从属于东方教会(聂斯托利派),崇拜语言使用叙利亚文。亨弗雷斯(C. W. Humphreys)和迪尔默(Percy Dearmer)

① 刘廷芳主编:《紫晶》,1934 年第二期,第 280 页。

② 同上,第 270 页。

③ 同上,第 285 页。

④ 刘廷芳主编:《紫晶》,1936 年第一期,第 97 页。[LEW Timothy Ting-fang, ed., *Zi jing*, no. 1 (1934): 97.]

将其从叙利亚文翻译为英文，收录在迪尔默参与编写的《英文赞美诗》（*The English Hymnal*）1906 年第一版之中。^①

选择这首圣诗有很重大的意义。最早传入中国的基督教即七世纪的东方教会（聂斯托利派），和马拉巴教会同出一源。而《马拉巴礼拜歌》经由叙利亚文-英文-中文的转译，加上本自德国的配乐（约翰·S·巴赫改编的 *Ach Gott und Herr*），非常具有普世主义色彩，超越了民族和教派。当时的英国是处于鼎盛的维多利亚时期之后，爱德华时期之初，仍然有万邦来朝的气象，所以录入印度、爱尔兰风格的圣诗也很正常。但杨荫浏翻译《马拉巴礼拜歌》、《圣巴特里克铠甲歌》并没有大英帝国式海内归一的抱负，反而可能更加认同印度和爱尔兰这些受到其侵略和压制的国家，与其建立本土化民族教会的初衷一致。

三、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倾向

刘廷芳和杨荫浏对圣诗的遴选以及翻译的时候，对圣诗内容的增删也体现了他们在神学立场方面的倾向，比如普世化和本色化并重、强调社会福音（基督教社会主义）等等，为此不惜进行创造性的意译甚至改译。如《紫晶》1934 年第二期第 269 页，就说明了《传布救恩歌》“本译词因欲避免格林兰、印度、非洲、锡兰等普通人不能知道的专门名词，不是直译”，“第一节完全重写，第二节首句也略有变更”。

《小小水滴歌》（*Little Drops of Water*）是杨荫浏和刘廷芳 1934 年译出，刊登在《紫晶》1935 年第一期上的圣诗。^②至于《小小水滴歌》的第四段和第五段，和原文差异就比较大了，而这种有意而为的差异是和译者的普世化和本色化倾向分不开的。原文的字面意

^① Percy Dearmer and Ralph Vaughan Williams, eds., *The English Hymnal*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06), 463.

^② 刘廷芳主编：《紫晶》，1935 年第一期，第 87 页。

思大概是这样的：“年轻的手种下的怜悯种子虽小，却成长起来远至异教徒的土地，福佑各族。荣耀永属美好慈爱的至高上帝，直到万世。”但译者将第四段“成长起来远至异教徒的土地，福佑各族”转译为“能够开出香花，施福千万众”，而“异教徒的土地”字样被全部删除。原文是体现了非常明显的宣教情怀。中文译者并非反对宣教，只是不巧正值生活在“异教徒的土地”上，因此将该敏感且不利于本土教会发展的词句撇下不译。同样，《得胜歌》第二段的“异教徒的土地”也被转译为“万民”。与此相似，《传布救恩歌》（*From Greenland's Icy Mountains*）^①中“盲目的异教徒”也被转译为“盲目的人类”。

然而，除了普世化和本土化并重的倾向之外，我们更在圣诗的译创上看出了积极的社会福音立场。《小小水滴歌》第五段的译文是“小小和爱事情，小小温柔话；能使世间改善，变成天父家。”这与原文简直没有任何关系了。由此，我们可以思考一下译者的出发点是什么。除了紧扣对关键词“小小”的强调之外，该译文还体现了“人间天国”的思想，号召要以善行在此世之中建立新的世界。而《得胜歌》也有“光明天国实现人间”的自创词，为原文所未有。

其他一些圣诗译文中也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倾向。译者一方面是有意选取了这些圣诗，另一方面则进一步深化了原有的进步色彩。以刊登在《紫晶》杂志 1935 年第一期上的《神圣同志歌》（*Jesus, Thou Divine Companion*）为例，^②原文中的 companion 意思是同伴，但刘廷芳和杨荫浏翻译为革命色彩浓厚的“同志”。该词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时期便广泛使用，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仿效前苏联，更是使“同志”成为了一般民众最为常用的称谓。而第一段的最后一行“你教导我们劳动是好的”，被译为

^① 刘廷芳主编：《紫晶》，1935 年第一期，第 268 页。

^② 同上，第 84 页。

“一切劳动都神圣”，将“劳动”提升了一个档次，成了超越世间俗务的行为，本身是神圣的，也使劳动者自身得以圣化。

刊登在《神圣同志歌》之后的就是同样具有革命精神的《劳工歌》(*When Through the Whirl of Wheels*)。^①原诗是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杰弗里·肯尼迪 (Geoffrey Anketell Studdert Kennedy) 于 1921 年为工业基督徒团契 (ICF, Industrial Christian Fellowship) 所写，有很鲜明的“左翼”特点。在这首圣诗中，肯尼迪描述了那个时代工业的发展、产业工人群体的壮大及其劳苦。在他的眼中，主耶稣基督以自己的受苦与受苦的众人同在，并且以自己的能力使他们获得能力和希望，在日常的工作中坚忍不拔，为他做工，并满怀信心等候他的复临。肯尼迪也身体力行，在一战中作为随军牧师为将士效力，身带香烟以慰军，被昵称为“卷烟威利”(“Woodbine Willy”)。^②大文豪詹姆斯·乔伊斯也曾经在《芬尼根守灵夜》里提到了他。^③肯尼迪逝世于 1931 年，有完整词曲的《劳工歌》于 1931 年出版，而 1933 年刘廷芳就选择了这首圣诗来译为中文，非常紧随时代，也表现出他对社会进步的关怀。在译文中，刘廷芳还补充了一些原文没有的词，比如第二段第一句的“环球工厂”一战之后，世界范围内工业发展迅速，中国也不例外。刘廷芳在翻译《劳工歌》的时候，必然想到厂房林立的现状，才加进了这一句个人的阐释。

此外，刘廷芳还翻译了《劳动同志歌》(*My Master Was a Worker*)。^④这首圣诗的原作者塔兰特 (William George Tarrant) 是一位论教派的神职人员，本为铁匠，原诗中确实用了 comrade 一词，刘廷芳将其译为“同志”，这无疑是一种正确的直译。只是需要看

^① 刘廷芳主编：《紫晶》，1935 年第一期，第 85 页。

^② 关于《劳工歌》原文背景，参见 Raymond F. Glover, *The Hymnal 1982 Companion: Essays on Church Music*, vol. 1 (New York, NY: The Church Hymnal Corporation, 1990), 498.

^③ Roland McHugh, *Annotations to Finnegans Wake*, 3rd edition (Baltimore, Marylan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6), 351.

^④ 刘廷芳主编：《紫晶》，1935 年第一期，第 83 页。

到，刘廷芳之选择翻译这一类宣扬社会主义的诗歌，必然也是出于社会福音的重视。

我们已经看到，在刘廷芳对于圣诗的选择和翻译中，颇有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倾向。这当然是与当时的社会思潮分不开的。从 19 世纪后半期开始，基督教社会主义在英国非常有重要的影响，教会中出现了很多这样的思想家，包括伦敦国王学院英国史和文学教授茅里斯（Frederick Denison Maurice），剑桥大学现代史皇家教授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等等，他们以《圣经》中的“左翼”教导为论据，推动基督教对社会进步发展方面的作用。而彼时源自西方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在刘廷芳创作翻译这些圣诗的 20 世纪 20-30 年代，也已经开始大量通过译文或著作，在中国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中间广为传播。

事实上，基督教与社会主义思想在理论上有先天的契合。基督教在诞生伊始，就是一种消弭社会阶层隔阂、性别对立，倡导劳有所得的平民宗教，在此不妨略举几例《圣经》中被视为具有普世关怀性质的经文。如《使徒行传》2:44：“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使徒行传》4:32：“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帖撒罗尼迦后书》3:10：“若有人不肯作工，就不可吃饭”；《雅各书》5:1：“嘻，你们这些富足人哪，应当哭泣，号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雅各书》5:4：“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等等，这在当时等级划分比较严格的社会中是有着积极的进步色彩的。正如耶鲁大学教授米克斯（Wayne A. Meeks）所说，在《新约》中，使徒保罗逆转了罗马世界对社会阶层的固有看法，提升了

平民的地位，认为上帝所拣选的正是这些人。而他的书信的受众则范围很广，包括了“各样阶层、财富、出身、种族的男人和女人”。^①

事实上，与英国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潮同一时期，很多基督教会之外的思想家也指出了早期基督教的“无产阶级特性”。恩格斯在《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A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Primitive Christianity”）中这样说道：

我们在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之中可以看到，它与现代工人运动之间具有值得注意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将二者联系在一起。在起初的时候，作为工人运动的的基督教是被压迫者的运动，它首先是奴隶、解放奴隶、被剥夺权利的人、被罗马征服和遣散的民族的宗教。^②

恩格斯在对《启示录》的评注中，引用了勒南（Ernest Renan）的一句话：“如果你想清楚地知道最早的基督徒群体是什么样子的，那么就不要将他们与今天的教区会众相比；他们更像是第一国际的地方分部。”^③他对勒南的观点持肯定态度。接下去，他继续评论道：“基督教和任何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一样，都是群众所创立的。”^④而全球工业化生产背景之下的这种左翼思潮也影响到了圣诗的创作和选编。1906 年第一版《英文赞美诗》的主要编者迪尔默就是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迪尔默选取了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圣诗进行翻

^① Wayne A. Meeks, *The Origins of Christian Morality: The First Two Centurie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62.

^② 恩格斯：《恩格斯论宗教》，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第 19 页。[Friedrich Engels, *En Gesi lun zong jiao*, trans. Department for the translation of the works of Marx, Engels, Lenin, and Stalin,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Beijing: People's Press, 2001), 19.] 本文基于英语和法语译本，对引文的个别词句做出了修改，下文亦同。

^③ 恩格斯：《恩格斯论宗教》，第 11 页。

^④ 同上，第 12 页。

译和辑录，而这些圣诗及其“左翼”特点也经由刘廷芳、杨荫浏等人的译介进入了中文圣诗的视野。

可以说，刘廷芳本人正是持有并强化了这种基督教自身所固有的社会福音的立场。他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做出过这样的叙述，来表明自己对基督教在现世的社会中施行拯救和变革的观点：

数十年来基督教有好些学者和服务的忠仆，研究圣经，恍然明白基督救世主义不仅是救个人的救主。救世主义并不是专讲来世的。他们就着书演说，提倡社会观的基督教义。起初这种理论颇受一般信徒反对，渐渐明白的赞成的人多起来了，到了今日虽遭受旧派的积极攻击，愈传愈盛，教会静察时势，潜考圣经，也渐渐的转向社会观的教义。^①

在这篇文章中，刘廷芳肯定了华北学生夏令会起草社会信条和进行的计划的行为。在他看来，每个信徒的信仰都可以落实到对整体社会的变革上，灵修并不仅仅在于个人内在的灵性操练，更是在于产生向外的力量以推动世界的进步。在他看来，“改良社会不能不从改良个人的灵性道德入手，这是基督教千余年来宣播的宗旨，这宗旨和改良社会的信条是不相矛盾的，实在是互相作用的，我们切莫偏重了一面。”^②而杨荫浏更是非常尊重刘廷芳，将其敬称为“廷芳师”^③。这样，刘廷芳和杨荫浏在圣诗的选择和翻译上采用较为进步的立场也就不足为奇了。只是这种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教会内部的传播的影响及其评价并非本文兴趣所在，而似乎刘廷芳、杨荫浏的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也应该放在一个更大的早期左翼思想在中国知识界的传播的社会思潮中作如是观。

^① 见《社论》一文。刊于刘廷芳主编：《生命》第二卷第三册，1921年10月15日，第1-4页。[LEW Timothy Ting-fang, ed., *Sheng Ming*, vol. 2, book 3 (1921): 1-4.]

^② 《社论》，刊于刘廷芳主编：《生命》第二卷第三册，第1-4页。

^③ 参见《圣歌探讨之初步》，刊于刘廷芳、杨荫浏主编：《圣歌与圣乐》第一期，载于《真理与生命》1934年第一期，第33页。

结语

在 20 世纪 20 到 30 年代，继周作人等知识分子围绕中文和合本《圣经》翻译的讨论之后，基督教圣诗的中文翻译及其讨论在教会内外蔚然成风。这一翻译活动以燕京大学为主要的活动地点和思想交汇的处所，受到了数个宗派的联合工作的推动，而以刘廷芳、杨荫浏为代表的圣诗翻译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在燕京大学的《紫晶》、《圣歌与圣乐》等杂志上发表了对圣诗翻译的研究文章，更是刊登了为数甚多的圣诗中文译本或是原创圣诗，这些作品体现了当时的基督教会对基督教本色化的主张，同时也不失对基督教普世主义的关怀。不仅如此，这些中文圣诗中还表现出了明显的社会福音倾向，这与圣诗原文的成诗年代乃至中文圣诗的译创年代和翻译者本身的神学立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的中文圣诗译创也有着深远的影响。这样看来，尽管早期基督教圣诗翻译还体现着鲜明的个体神学立场的局限性及其时代烙印，但他们所开辟的中文圣诗创作领域及其本土化探索的艺术方向，本身就构成 20 世纪中国基督教发展历程中一个影响深远但却容易被研究者所忽视的侧面。

参考文献[Bibliography]

西文文献[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

- Dearmer, Percy and Ralph Vaughan Williams, eds. *The English Hymnal*.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06.
- Glover, Raymond F. *The Hymnal 1982 Companion: Essays on Church Music*, vol. 1. New York, NY: The Church Hymnal Corporation, 1990.
- McHugh, Roland. *Annotations to Finnegans Wake*. 3rd edition. Baltimore, Marylan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6.
- Meeks, Wayne A. *The Origins of Christian Morality: The First Two Centurie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中文文献[Works in Chinese]

- 恩格斯：《恩格斯论宗教》，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Engels, Friedrich. *Engesi lun zong jiao*. Translated by Department for the translation of the works of Marx, Engels, Lenin and Stalin,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Beijing: People's Press, 2001.]
- 雷立柏：《论基督之大与小：1900-1950年华人知识分子眼中的基督教》，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Leeb, Leopold. *Christianity in the Eyes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1900 to 1950*.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00.]
- 刘廷芳、杨荫浏主编：《真理与生命》1934年第一期。[Lew, Timothy Ting-fang and Yang Yinliu, eds. *Zhen li yu sheng ming*, no. 1 (1934).]
- 徐以骅：《教会大学与神学教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年。[XU Yihua. *Christia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and Theological Education*. Fuzhou: Fujian Education Press, 1999.]
- 翟凤俭：《杨荫浏：中国宗教音乐研究的拓荒者》，《中国宗教》2009年第二期，第24页。[ZHAI Fengjian. "Timothy Ting-fang Lew: APioneer in the Research of Religious Music in China." *China Religion*, no. 2 (2009): 24.]

左芙蓉：《社会福音、社会服务与社会改造：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历史研究，1906-1949》，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ZUO Furong. *She hui fu yin, she hui fu wu yu she hui gai zao: Beijing jidu jiao qing nian hui li shi yan jiu*. Beijing: Religious Culture Press, 2005.]